

文 史 刍 论

傅 杰



海豚出版社

文史刍论

傅杰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史刍论 / 傅杰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10-3331-4

I. ①文… II. ①傅…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668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朱敬利 杨文建
封面设计: 杨小洲 张 西
责任印制: 于浩杰 王瑞松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 开 (889毫米×1194毫米)
印 张: 11.75
字 数: 165千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3331-4
定 价: 8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	1
章太炎与汉语修辞学	111
章太炎、刘师培、陈寅恪论《马氏文通》	132
关于陈寅恪史观的两个问题	146
段玉裁评传	163
《管锥编》称引段王说平议	181
钱锺书说《论语》举隅	208
子见南子杂俎	228
义理对训诂的制约作用	254
二十世纪的义理与考据之争	265
先秦至明代的校勘源流述略	286
文史商兑录	325

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

一

钱穆出生的十九世纪末叶，“就中国考古学材料的出现而言，是一个重要而光辉的时代”^[1]，许多前此不多见甚至从未出现过的古物相继重现人间，而在学术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就是甲骨文的发现。

梁启超在一九二六年所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中，称甲骨文的出土是考古学界最近的“一种很大的兴奋”：

于是中国小学界——即文字学，起一大革命。从前臆断许多造字的原意，臆断错了的，都可以得相当的改正。还有许多历史上重大事实，古书上记载大略，令我们看不懂的，或者认为很荒唐的，都可以得到相当的补充及证明。这种东西，孔子所不曾见的，我们居然看见了；孔子所不知，我们知之；孔子说错

了，我们校正。此外则古代的社会风俗、制度、心理，亦可推想许多出来。^[2]

甲骨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但要是夸大了这种“兴奋”的普遍性，那也不是事实。国学大师章太炎就始终对甲骨文持怀疑态度。由于甲骨学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商贾乘机仿制赝品，让行家也难辨真假；这种令传统文字学“起一革命”的文字材料与章氏熟稔的传统小学体系不尽相同，就是功深心细的学者，在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失误；而像每种新兴学科一样，甲骨学又吸引了一些欠缺学养却热衷时髦的浅妄之徒，来作射覆之戏，发奇怪之论，加之以甲骨学著称的罗振玉的人品又是他鄙夷的，这一切都不可能使章氏“兴奋”起来。他专门撰《理惑论》，在对金石学家尊信鼎彝这类“矫诬之器”曲证经义、驳订《说文》不以为然的同时，也对包括“一二贤儒”在内的学者尊信甲骨这类“荒忽之文”表示遗憾：

又近有掇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

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礼》有蚌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梁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蚌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者随侯之珠，照乘之宝，珎珎之削，馀蜺之贝，今无有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亦慎欤？^[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发掘殷墟，获致大量甲骨，参与其事的学者试图以实证消弭章氏的偏见。据徐中舒说，沈阳事变之后，傅斯年曾想邀北来的章氏参观北平史语所的殷墟实物，而“艰于自致，太炎先生亦不果往，遂终不见此三千年前遗物”^[4]。也许徐氏想来，章氏既睹实物，或可幡然悔悟，这也代表了甲骨学家的普遍愿望——尽管

他们完全自信甲骨文的“真贋固不系于太炎先生之言”^[5]。郭沫若也因为章氏在给金祖同的信里说了句“钟鼎可信为古器者什有六七，甲骨之为物，真伪尚不可知”，以为章氏于鼎彝已由怀疑变为肯定，于甲骨则由否认变为怀疑，是太炎“为学之进境”，就一厢情愿地“深信‘甲骨可信为古物者什有六七’之语，必将出于章先生之笔下矣”^[6]。

其实甲骨实物，章氏或已亲睹。据王仲荦回忆，章氏曾示以甲骨而谓之曰：“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王氏推衍说可见章氏并不是说甲骨文都是假的^[7]。而早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许寿裳《章炳麟传》一书，设立“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一节，述章氏晚年因见及孙诒让、王国维及罗振玉等甲骨学专著，“亦改变前说，认为甲骨文是可靠的。对于罗振玉的著作，说亦有可采处，真所谓‘君子不以人废言’。惜乎此意未及写出，遽归道山，连腹稿亦埋藏地下，是多么不幸的事”。许氏并称：“时至今日，还有不明底细，援引先生早年《理惑论》之句以疑契文者，信口胡说，未免太可笑了。”^[8]其言较王氏尤凿凿。但综观章氏的公开言论，对甲骨文及甲骨学的怀疑与

否定，则是始终一贯的，晚年在《今字解剖题辞》及与邓之诚、金祖同的通信中都有表露^[9]。而逝世前九个月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他讲授小学时论及甲骨，不仅持论仍与《理惑论》无异，而且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清人则附会六书，强为解释。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欲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哗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著龟而外，不见其他。《淮南子》云：“牛蹄蝼蛄，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可见古人稽疑，灵龟而外，不事骨卜。今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土无有也。《庄子》言宋元君得大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唐李华有《废卜论》，可见龟卜之法，唐代犹存。开元时孟诜作《食疗本草》，宋苏颂《图经》及《日华本草》，皆言已卜之龟，必有钻孔，名之曰漏天机。虽绝小之龟，亦可以钻十孔。钻孔多则谓之败龟板也。夫灼龟之典，

载于《周礼》。凿孔以灼，因以观兆。无孔则空气不通，不能施焦，无以观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贯，而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伪作欺人，一如《河图》、《洛书》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约略与金文相似，盖造之者亦抚摹钟鼎而异其钩画耳。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笈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若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大抵钟鼎文之可识者，十可七八，刀布则十得五六。至于龟甲，则矫诬之器、荒忽之文而已。^[10]

出于审慎而对甲骨文采取存疑态度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史学家吕思勉。在章氏逝世后的三十年代末，吕氏完成了《先秦史》讲义，一位学生读后即以其未用甲骨史料为异，提出了充实的建议；吕氏回答说甲骨文颇多伪造，对此未尝有所研究，故拟从缺^[11]。在四十年代初正式付梓的《先秦史》“古史材料”章中，吕氏复申说其意：

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盖在财产私有之世，事无不为稻粱之谋。

而轻脱自惠，有意作伪，以为游戏者，亦非无之。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迨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员访察，则作伪者确有主名；而市肆所流行，真者且几乎绝迹（见《安阳发掘报告书》第一期《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晚近众目昭彰之事如此，况于年久而事暗昧者乎？^[12]

当时的殷墟考查报告，在吕氏看来，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关于伪物猖獗的记叙；作为主体的发掘所得则几无足观，因以“其事甫在萌芽，所获太少”，而这种不见实物的考古报告“率出一二人，亦又未可专恃，借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鹬炙、见卵而求时夜矣”^[13]。

这种悲观论调与章氏如出一辙——尽管吕氏承认这些“所获太少”的发掘品不同于伪物，但对其前的甲骨文乃至甲骨学，则明确认同章氏的《理惑论》，几乎全部予以否定：

故此物最近发掘，众目昭彰者，自可据为研究之

资。其前此所有者，则为矜慎起见，不如弗用之为愈也。乃近人多好据之以言古史，其魁桀当推王国维。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据甲骨文，以王亥为殷之先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中宗实为祖乙，疑《史记》报丁、报乙、报丙之次为误。其所得先公之次，适与十干之次同，明系作伪者不娴殷代掌故，亦曲说为诸公生卒之日，汤定祀典时已不可知，即用十日之次追名之。又作《殷周制度论》，谓周人言殷礼，已多失实；甚至谓殷人祭无定制，或九世，或廿世，或八世，或三世，或二世，或五世，或四世，而不顾其事理之不可通也。章炳麟《理惑篇》谓言古物者，首贵其人之贞信。民国以来，有矢忠清室者，大抵愚暗无识之人。王氏早岁治叔本华之学，议论精辟无伦，断非愚暗无识者，而晚岁亦以清室遗老自居，立言是否由衷？令人不能无惑。^[14]

明白了吕氏的这种顾虑，我们就不会奇怪在这部颇具规模的上古史中，他为什么会“于近世据殷墟甲骨以言殷事者，皆不之取”。平实的治学态度与深湛的文献功力，使吕氏内容周赡、叙次井然的

《先秦史》跟他其余三部著名的断代史一样，一直并将继续为士林所推重。但就对甲骨文材料的排拒而言，就是最服膺他的学生，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缺憾^[15]。

比起章太炎与吕思勉，他们各自的门人黄侃与钱穆对甲骨文的态度显得更为复杂。

由于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不亚于其师的贡献而与章太炎并称章黄的黄侃，在对待传统小学与钟鼎甲骨文字的关系问题上，与章氏自易有相近之处。在《说文略说》中，我们可以听到《理惑论》的回响，但调子较乃师已略有不同：

今自宋以来，彝器踊盛；近日甲骨诸文，出自泉壤，虽其物未必皆贗，而说者纷纭，无师以正。汉世说经者，于《古文尚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以无师说，称之曰逸。晚近古器，虑亦同兹。^[16]

他不但与章氏一样鄙视罗振玉，对章氏未予点名的王国维亦颇为不屑：

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

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藏书，洎上掇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罗振玉且著书，且行贾，兼收浮誉利实，国维之助为多焉。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现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17]

受到批评的不但有在他眼里缺乏经学根柢的王国维，还有于经学有深厚素养与突出成就的孙诒让。原因不在孙氏考释的具体得失，而主要在其遽取甲骨钟鼎这些“即偶有一二明白可信者，尚当在慎取之列”的“后出之文，欲以陵驾许书之上”^[18]的目的和动机。作为甲骨学的开山，受当时研究材料与研究水平的局限，孙氏的甲骨文考释多有失误，罗振玉、王国维亦屡有纠弹^[19]。但从目的和动机上来对孙氏进行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就出土时间来说，甲骨

文与多数金文较之《说文》固属“后出”；但从发生顺序来说，则《说文》相对于那些“无师以正”的古文字资料，大抵只是“流”而不是“源”。这一点黄氏当时似乎并未考虑，但其后他有所悟及：“山川鼎彝，洵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不免过“隘”^[20]。这不仅与他过去的论调不侔，更与章氏《理惑论》所谓“世人尊信彝器，以为重宝，皮傅形声，曲征经义，顾以《说文》为误，斯亦反矣”的观点，几近针锋相对。而言及甲骨则以为：

近世洵上发得古龟，断缺之餘，亦有瑰宝，惜搜寻未遍，难以详言。倘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21]

他把甲骨文作为小学家必须闻问的对象，提出“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氏所云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22]。而对孙诒让的金文乃至甲骨文著作也不再一味否定，而是作为参考读物推荐给后学：

又言思治文字学以赞《说文》，亦望勉力为之。然当分为二类，一则宋以前古文之学，自《说文》所载外，如《周礼》故书、《仪礼》古文及《字林》、《古文官书》、《一切经音义》所称古文悉为董理；一则宋以后迄于今，兹所号为古文字之学，先欧阳、赵、吕、薛、三王、洪氏之书，细为审误，然后治清世阮、二吴三书，参以孙君之见，次及龟甲，亦从孙氏入门。^[23]

他已不像章氏那样否认甲骨文本身的可信，而对当时的甲骨学研究则殊少信任。孙书作为入门参考固无可，但仍非他心目中的惬意之作。所以他又教授门人说钟鼎甲骨文字已经“不容致疑，惜其解说犹有可疑处，故学者莫如先玩其拓文，而不必急读其解说可也”^[24]，深恐后学为流行的“谬悠之说”所误。自己则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在他的书信日记中，留下了购求《铁云藏龟》、《殷虚书契前编》、《殷虚文字存真》、《龟甲兽骨文字》、《簠室殷契征文》、《殷虚书契待问编》等甲骨文以及金文书籍的记录，并用起来跟《说文》比勘^[25]。在其子编印的《量守居士

遗墨》所附的黄侃著述目录中，赫然在列的就有《钟鼎甲骨考》等目^[26]。

黄侃对甲骨文的态度比章氏积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对甲骨文的称述与购阅都只见于他的通信及日记，他的甲骨专著未见付梓而且不详存佚。而最为学者传诵的，仍是他那些包括对甲骨钟鼎之学有所质疑的传统小学论著。因此在世人的印象中，黄氏更多还是以—一个甲骨钟鼎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以致到黄氏辞世六十余年后的今天，胡厚宣还要专门撰文为其辨诬^[27]。而黄氏本人在甲骨文的认识问题上，也是充满了矛盾甚至痛苦的。杨树达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林景伊来，告余曰：黄季刚于没前大买龟甲书读之，尝语渠云：“汝等少年人尽可研究甲骨，惟我则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余谓季刚始则不究情实，痛诋龟甲，不免于妄；继知其决非伪物，则又护持前错，不肯自改，又不免于懦矣。^[28]

我们不知道黄氏是怕引起外人对他的前后出入、学无宗主的“诋讥”，还是怕受到对门人研治甲骨深